



20世纪

邹振环 著

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ERSHISHIJI SHANGHAI FANYI CHUBAN YU WENHUA BIANQIAN

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20 世纪上海翻译 出版与文化变迁

邹振环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邹振环著.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20 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ISBN 7-5435-3161-5

I .2... II .邹... III .翻译—出版工作—文化史—研究—上海市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045 号

20 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邹振环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16.375 印张 326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435-3161-5/G·2377 定价: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言

1897年10月，立志改革救国的章炳麟与常州人恽积勋、董康，无锡人杨模等在上海组建了一个译书公会，确定以采译东西各国切用书籍为宗旨。该会章程中说：“考各国书籍浩如烟海，中国从前所译各书，仅等九牛一毛。兹已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气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饷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于此兢兢焉。”为什么要花如此之大的力量翻译出版这些著作？章炳麟为译书公会撰写的宣言书性质的《译书公会叙》作了相当清楚的解释。他写道：

互市以来，所传译泰西书，仅逮四百种，兹无错愕也。是四百种者，既剗剗刻镂，不遍流布，拘学伐夫至不能举其目，兹亦无错愕也。虽然，瞽者美瞽者，瞽者美明者。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翊之，吾则瞽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息更，其事立变，若乔木之移阴，若蛇蚺蜥翼之移壤，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智，其焉能与之终古？……

嗟乎！五十年以往，士大夫不治国闻，而沾沾于声病分隶；戎士视简阅仅若木熙，无一卷之书以教战者。怀安饰誉，其祸遂立见于今日。故定武之书，郊居之赋，天地以弱文化之国；绿耳之骑，大黄之矢，天地以弱用武之国。一旦变易，官无其法，法无其人，人无其书，终于首施两端，前却失据。

悲夫！以草莱数人，仅若稊米，而欲绌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斯又夸父、精卫之续也。独尝借观于邻国，日本得王仁以《论语》《千字文》传，其后经术艺文遂什伯百济。泰西政艺，各往往取诸希腊、罗马，而文明远过其本。然则译书公会者，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羸蛤之积而为巨石也！乌呼，斯又夸父、精卫之志也。

译书公会，是上海也是当时全国由维新志士组建的第一个以翻译出版为职志的民间社团，该会出版的周刊《译书公会报》是当时上海也是全国第一份直接以译书命名的刊物。上述《译书公会叙》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他们所意识到的译书所担负的时代使命，这就是思想启蒙——开民智，为社会政治改革提供借鉴——左政法。

邹振环的这部《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以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近代以来的翻译出版如何成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翻译出版的内容选择、兴衰起伏又如何同社会政治变革休戚相关、同声相应，上海又如何因为处于启蒙运动及社会政治变革的前沿而使翻译出版经常得全国风气之先，乃至执全国翻译出版之牛耳。

邹振环自 1978 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来，对于近代翻译出版事业的变迁可谓情有独钟，学士论文以此为对象，硕士论文又以此为对象，博士论文仍以此为对象。1996 年出版的《影响中国近

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998年出版的《江苏翻译出版史略》，不久前出版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就是他这些年来精心研究的一部分成果。贡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新著，集中展示上海翻译出版的历史，尤为可贵的，是叙述了先前研究者较少触及的近数十年来翻译出版的特殊经历，和他先前的几部著作将相得益彰。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不是简单地胪叙翻译出版状况。作者将翻译出版作为学术史、文化史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将翻译出版的风云变幻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使本书较之一般出版史更有深度。

翻译出版，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一种文化现象，本身就亟富研究价值。因为翻译出版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更重要的，它代表着不同语言文字所表现的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体系的互相接触、互相对话、互相理解乃至互相渗透。

文化和语言文字有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人们的思维活动，只有借助于语言概念方能进行。人们的文化活动，可以通过音乐语言、肢体舞蹈语言、视觉语言进行，但是，最普遍最广泛运用的，仍是口头语言及文字语言。翻译，将一种语言写成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写成的文本，克服读者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距离乃至屏障，首先要求翻译者本人缩短自身与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距离，对所译的对象所代表的文化有深切的体认，再将这种体认在本国文字语言所表现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构成部分，借助译文，使读者得以对于原先的文本有较为正确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优秀的翻译家，必然是对两种不同文化都有相当深切了解的文化学家，翻译活动必然成为不同文化的不断对话、彼此理解。而一旦将原来的文本翻译成本国语言，成为本国文化所能准确把握的范畴、概念或

语意,那么,它实际上就已渗透进本国文化,成为不同文化互相融合中的一个过渡性环节。

翻译本身,是沟通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体系,甚至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翻译家,关注的重点及热点之所以常常有很大差异,除去个人兴趣外,更多的是根源于文化自身的变迁。同一部著作,在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那里,解读可以完全不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误读、甚解,除去个人水平外,更多的是文化背景的相异。近代以来,从西方,从日本,引进了大量新的词汇,并使大量老的词汇具有了全新的内涵,但是,同一词汇,人们的理解或人们所作的意义诠释,差异却是如此惊人,便是明证。翻译出版史的研究,将引导我们从这种文化的对话、误解与正解,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变迁。

值此 20 世纪行将结束、21 世纪正迅速到来之际,信息时代已经通过网络世界而悄悄开始。世界相互联系更紧密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借助电脑而以空前的效率急速地沟通和转换。在这一时刻,翻译的使命不是减轻了,而实际上是更加沉重了。因为世界上各种文明、各种文化、各种语言都参与到彼此直接联系中来了,如何推进它们相互之间的积极对话和准确理解,关系着地球村的和平、安全及其能否持续发展。翻译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正由越来越广大的参与者群来共同加以推进。翻译出版的一个新的繁荣时代的到来,将完全是可能的,也许将是不可避免的。

姜义华

2000 年 5 月 27 日于复旦大学

绪 论

我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最后一个冬天,迎来 21 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对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的精神历程的回顾与反省的工作,在若干年以前已经展开了。今天来写 20 世纪的学术文化史,肯定还需要资料上的积累,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时间距离。20 世纪是一个人类走向全球化和信息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世纪,考察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化变迁,就不能离开对这个世纪里传播媒介和交流载体的剖析。任何人都会否认,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了翻译出版这一交流载体的影响。早在 1919 年,朱自清就指出了:“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本国来的第一件利器。”^① 翻译出版成了晚清以来文化史的最重要的一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等伟大的革命家,从康有为到梁漱溟等出色的思想家,从梁启超到鲁迅等杰出的文学家,从李善兰到任鸿隽等重要的科技传播者,都与翻译出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近现代以来很多的出版家,从王韬、张元济到邹韬奋,他们都深知翻译出版事业的重要性,一部中

^① 朱自清:《译名》,载《新中国》1919 年第 1 卷第 7 期。

国近现代的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一部千辛万苦寻求独立和富强的历史,也是通过翻译出版向西方探寻真理而不懈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20 世纪是中国翻译出版的世纪。

一、“翻译出版”概念的释义

讨论翻译出版,我们首先要弄清“翻译”与“出版”两个概念,才能说清两者之间的联系。“翻译”一词的基本定义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①。西汉扬雄《方言》卷十三称:“译,传也。”这种“传译四夷之语”的释义,早在我国第一部字典——许慎《说文解字》中就已经有了。作者认为,“译,传译四夷之言者,从言罍声”,并从训诂的角度指出“译”也写作“囙”,“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囙’,读若‘譌’”^②。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化”在翻译中的作用。^③ 根据史籍的记载,南北朝时代,“翻译”两字已开始连用。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宋建康龙光寺佛驮什》中写道:“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④《隋书·经籍志》:“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这里的“翻译”指译员。唐代僧人道宣在《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论》一文中讲:“观夫翻译之功,诚远大矣。”^⑤ 这里的“翻译”当指翻译活动。

① 《辞海》(1999 年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2336 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年,57 页、129 页。

③ 参阅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 年,696 - 697 页。

④ 《高僧传》卷三,中华书局,1992 年,96 页。

⑤ 《全唐文》卷九一一,中华书局,1985 年。

中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起源很早,《周礼》和《礼记》两书中就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录。《周礼·秋官》中指出:大行人“属象胥,谕言语”。“行人”是周代负责接待四方使节与宾客的任务的官员的职称。《周礼·秋官·象胥》条又进一步阐明象胥的职责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说明早在周代,已有了相当规模的通过翻译进行文化交流的史实。《礼记·王制》还指出,周代对专管其他各地方的翻译人员还有各自不同的正式称呼:“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也反映出当时各地活跃的翻译活动。

中国有近三千年几乎未曾间断的翻译活动。中国翻译文献的组成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大部分;按时间序列,恰恰是中国翻译史的三个阶段。民族翻译留下的文字记录相对比较少。而佛典翻译文献和西学翻译文献的数量则相当可观,光译出的佛经,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唐代开元十八年(730年)的664年间,总计2278部,7046卷。经梁启超校勘,除去真伪重出者,合计实有968部,4507卷。^①西学翻译文献的数量更是多得难以计数。据美国芝加哥大学钱存训先生的统计:从16世纪末耶稣会士的译述开始至18世纪末,共有天主教文献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合计437种,19世纪前半期的翻译文献共有795种。^②1899年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统计了19世纪末560种东西学图书,顾燮光在《增版东西学书录》中,又与徐维则增补了至

①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六》,上海中华书局。

②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载《文献》1986年第2期。

1902 年的 347 种,顾燮光《译书经眼录》一书统计了 1902 年至 1904 年的译书共 535 种。^①另外,笔者估计 1904 年至 1911 年的六七年间,西学翻译文献有近 500 种。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大致估计出晚明至晚清的西学翻译文献有 3100 多种。民国时期,从 1912 年至 1949 年,前后共 38 年,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共收录北京、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所藏的 1911 年至 1949 年的各类中文图书共 124040 种。^②有关专家估计,译本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应有 40000 多种。1949 年全国解放后,究竟出版了多少翻译文献,至今尚未找到确切的统计数据。

与中国悠久的翻译文化的传统和数量巨大的翻译文献相比,中国的翻译研究的进展却极其缓慢。翻译研究涉及许多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它不仅要研究翻译的本体,探讨翻译的性质、作用、标准、原则和方法,如翻译形式(口译与笔译),翻译理论(直译和意译),翻译方法(初译和重译),以及翻译的风格和技巧等属于翻译的内部研究,还应包括翻译的外部研究,如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还有翻译史的研究,即研讨中外翻译的历史、理论、流派,专题翻译史(如文学翻译史、诗歌翻译史等),区域翻译史(如上海翻译史、香港翻译史等),以及历史上的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翻译出版也是翻译的外

① 这些数据系笔者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899 年刊本),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 年刊本),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27 年刊本)所做的统计,这样可以大致估计出至 1904 年为止,西学翻译文献有近 2674 种。1904 年后的西学翻译,目前还缺乏比较明确的统计资料。据谭汝谦的统计,1896 年至 1911 年的 15 年间,日文中译本总计 988 种,每年平均 66 种,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转译西学的内容。(参阅拙文《晚清西书中译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载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 3 辑。)

② 参见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载《出版史研究》第 2 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年。

部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所谓“出版”，是指选择某种精神产品，利用一定的物质载体进行复制以利传播的行为。中国古代的出版又称刊板、刊刻、刊行、付梓、梓行等，是指用雕版印书而言。出版的概念，首先是同图书形式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古代金文、石刻，甚至有关甲骨“有册有典”的记载，就是最原始的出版行为。隋唐时靠人工抄写流传的手抄本，也属于不太正式的出版活动。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儒家经典西京石经本第一次雕版印行，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政府出版行为。宋代以后，出版活动日趋发达，出现接受委托、从事刻印或出售书籍的书商。有的则是文人兼事编纂刻印，成为出版家。直至近代，从西方传入铅字排印、机械印刷技术之后，才正式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出版”这一概念。

传统的中国文献中至今尚未发现“出版”这一整词。“出版”一词系外来语的多义词：英语“Publish”可作“公布、发布”、“发表、宣传”、“出版、发行、刊印”解，“Publication”可作“发表公布”、“出版发行”解。这个专业名词，在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学人的书信文章中。清末辞书中的解释是：“为发表思想，以机械、化学等方法，刷印文书、图书而颁布也。（乐谱亦在图书中，惟广告及织物、食品、建筑物等附文字绘画者，不得为出版。）颁布者不论赠卖，皆可借公众观览，刷印何种，亦可自由。不须受官署许可及纳保证金。惟发行日前，先以样本两部，呈内务省为要，凡出版物，当载发行及刷印

著述者姓氏居处,又刷印年月日、刷印所等,于卷尾。”^① 这条释文显然是从日文辞书上直接译出的。据日本原书房出版的《日本出版文化史》,早在 1756 年,日本已经使用了“出板”一词(在汉语中“版”与“板”相通)。明治三年(1869 年),日本政府就发布有《出版条例》。^② 很显然,中国使用近代意义上的“出版”这一整词,是从日文借用的。最早借用“出版”一词的,可能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梁启超《汗漫录·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提到了“出版自由”。翻译与出版的密切关系,早已为出版史的研究者所指出。^③ 译作的社会存在,取决于三种人的相互关系:即译者、出版者、读者——这也就是大众传播学上经常讨论的信息放送者、传播媒介和受众。本书所言的“翻译出版”,正是指从出版的角度来研讨翻译活动,分析译者如何选择译作,出版者如何编辑加工及投入流通领域,读者如何选择接受和评价反应。可以说,翻译出版是从文化的全方位,研究中外语言翻译和出版流通相交叉而产生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较早注意到“翻译出版”的问题并将其作为一个整词提出的,可能是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出版活动的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先生。他在 80 年代曾先后写过《翻译出版学刍议》和《翻译出版学初探》,指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出版是文字翻译成果的延续和传播,是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或多种文字之后,在传播面上的进一步扩散。可见,翻译与出版两者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并呼吁建

① 黄人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 年,64 页。

② 《“出版”探源(薛钟英致王益)》,载王益《不倦的追求》,印刷工业出版社,1997 年,65-67 页。

③ 参阅吉少甫《“出版”考》,载《出版发行研究》1989 年第 3 期。

立翻译出版学,认为这一学科的任务是:阐明翻译出版体系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演变;揭示翻译出版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在不同状态下的特殊规律;研究和调整翻译出版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制约因素。^①遗憾的是,这一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现的重要概念,没有引起翻译界的足够重视。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中,在以“翻译”起头的90多个词条中竟然没有“翻译出版”条,而有些根本不成词条的“词目”,却写入了这部建国以来最大的翻译百科全书。

二、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在解说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要讨论“文化变迁”的含义。“文化变迁”(Culture Change)指文化内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文化体系的全局性、整体性的变化。“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化变迁主要指文化环境诸现象的变化,如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等的演变;而社会变迁则主要指社会环境诸现象的变化,如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及社会生活的演变。社会变迁会引起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中往往包含了社会变迁。在整个人文现象中,有的既是文化内容,又是社会参数。有些文化变迁的现象,又是社会变迁的内容。^②因此,本书所言的“文化变迁”,常常是指“社会文化的变迁”。

文化何以变迁?它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古今中外的学者曾就

① 李景端:《翻译出版学初探》,该文是作者在1987年12月香港“当代翻译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后载《出版工作》1988年第6期。

② 参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395-398页。

此问题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解说,有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有从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的角度出发,也有从战争、人口迁徙、疾病流行、自然环境的改变等等方面进行阐发。德国文化圈派和英国传播学派极力主张,外来文化的传播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发现的过程。发现可以来自文化系统的内部,也可以来自外部的另一种文化复合体。发现的可以是新事物,如蒸汽机、克虏伯火炮,也可以是新思想,如三权分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我们讨论外国文化的影响,往往着眼于与外国文化人的直接交往(如杜威、罗素和泰戈尔的来华演讲)和出国游历而受到外国文化影响的思想、文化先驱,但在整个文化传播中,这类接触在规模上和力度上毕竟不占优势。马克思、列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巴尔扎克、雨果、孟德斯鸠、普希金、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爱因斯坦、霍金等,他们之所以能对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之所以能在广大中国读者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主要就是通过翻译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译作是文化传播的最为重要的载体。译作通过出版者的编辑加工投入流通领域,把外来的新的思想、新的元素引入自己的文化系统,新的思想和元素经过与传统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的激烈的摩擦、冲突,被自身文化结构所整合,成为自身文化获得生机和创造力的根本所在,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翻译出版活动,在历史上对促进人们的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对社会文化的更新与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一部人类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人类文化传播史。文化传播的结果会产生非算术相加所能得到的结果,同时还会激

发人们追求更多的知识、信息的兴趣和无穷的创造力。东汉以来,中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翻译出版在文化传播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文学角度来说,20世纪有影响的大作家无不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陈平原指出:“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①即使早期一些能直接阅读原文的作家也承认,阅读原文和阅读译作所体验的美感是完全不同的,何况能懂几国外语的作家毕竟只是凤毛麟角。解放以来,由于外语教育体制被破坏,很多作家无法直接阅读原著,因此受译文的影响甚深。沈善增在《“精神性”的加持》一文中写道:“从创作角度说,我的作品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很大。说是外国文学,其实是翻译文学,我都是通过译本来得到异乡他国的文学的滋养的。有时想想好笑,我们常说某某外国作家文笔如何优美,句式如何新颖,意象如何奇特,然而我们所说的‘文笔’、‘句式’、‘意象’究竟还是汉语的,译者的高级,是使我这样的受恩惠者把他们与原作者认同一体。”^②特别是“文革”以来,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常常被政治斗争所利用,孔子、孟子充当过这样的角色,《红楼梦》、《水浒传》同样充当过这样的角色。这些蹩脚的斗争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恶劣的后果,就是使在这一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和戏剧家对《红楼梦》产生了某种讨厌的情绪,对中国传统有了较深的隔膜,认为和自己的精神需求不相宜。作家陈丹燕说得很坦率:这一时代险恶的经

①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8页。

② 《作家谈译文》,译文出版社,1997年,129页。

历,“让人觉得中国的传统里到处都充满虚妄的谎言。我相信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着许多非常好的东西,只是我们已经无法对它们产生真正的血缘感情。而大量的翻译作品……它们不曾被利用,它们没有与周遭动荡现实的沟通,完全是一个充满感情力量的不同的世界”。它们造成了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阅读结构和表达特点:我们所汲取的是译文中那中西合璧式的营养,把中文译文当成自己亲切的语言。于是,这种特点至今仍对我们的语言产生着影响:形成了一种由翻译家改良了的中国文字的系统。^① 经历了“文革”的文化禁锢,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当大门忽然敞开,全世界各民族一百年来的人类优秀成果竞相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时间真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的文学阅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向外国文学,是很正常的”^②。这种文化失重的现象表明了翻译出版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有了怎样深刻的影响,不管我们对此是否否定还是赞赏,我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种事实:即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重大的社会与文化变迁,都与通过翻译出版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生着紧密的联系。

三、区域翻译出版与上海文化传统

近年来,区域文化的研究成了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水土多变,各地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地区性的文化差异,经过历史积淀,形成了多种区域文化,如关中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

① 陈丹燕:《被隔离的传统》,载《文汇报》1998 年 10 月 3 日。

② 赵长天:《〈变形记〉及其他》,载《作家与译文》186 页。